



# 论证模式、发展阶段与不同意义的“最早中国”\*

鲍奕凡

**摘要:**在当今“最早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文化要素模式”“身份观念模式”“政统模式”及“地域模式”四种不同的论证模式,从根本上导致了学者们各执己见的状况。四种论证模式中,“文化要素模式”在价值层面与技术层面都具有较高的合理性。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相比找出“最早中国”的排他性定义,指出不同意义上的“最早中国”或许更为合适。基于“文化要素模式”以及“国家形成阶段论”的理念,从“早期中国文化圈”“邦国”“王国”“帝国”四种考古学概念出发,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圈为中华文明发展基础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良渚文化为早期文明国家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二里头文化为广域王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而秦王朝为帝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

**关键词:**“最早中国”;“文化要素模式”;“早期中国文化圈”;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6-0121-07

近年来,“最早中国”问题不仅在学界内持续着激烈的讨论,还引发了公众的热议。2016年,由许宏先生、何弩先生作为讨论双方,孙庆伟先生担任主持人,“最中国”讨论在北大校园内展开,并进行了全网直播。而2018年许宏与孙庆伟先生在“三联公知大会”上的辩论更是将学界与社会的讨论带到了新的高度。辩论过后,赵海涛与许宏先生在《南方文物》上发文,再度阐释对于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定位<sup>[1]</sup>;《中原文物》亦开设专栏,邀请孙庆伟、韩建业、张国硕三位先生分别发文进行讨论<sup>①</sup>;陈淳、李新伟等学者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sup>②</sup>。在此期间,国务院新闻办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为讨论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在这些讨论中,不少学者清晰地认识到,当下存在分歧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对“最早中

国”这一命题中,不同学者对“中国”一词的词义有着不同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衡量“最早中国”的不同标准。问题讨论的范畴并不一致,自然导向了不同的结论。依笔者所见,在对于“中国”含义的不同界定之下,有着更为基本的分野,造成了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各执己见、难成共识的状况,或可称之为“论证模式”的分野。

## 一、四种论证模式

本文所指的“最早中国”问题的论证模式,可以理解为以某种载体为核心,通过回溯载体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承袭关系,从而找到特定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由于学术传统与学术取向的不同,当今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不同的论证模式进行研究。依据核心载体的不同,可以将论证模式分为四类:

收稿日期:2020-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太湖地区史前社会进程与文明形态研究”(18BKG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鲍奕凡,男,上海大学文学院本科生(上海 200444)。

(一)文化要素模式,即通过考察文化要素在各考古学文化与信史王朝间的传承、发展、汇集、扩散,来回溯文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

(二)身份观念模式,即首先梳理观念史中“中国”含义的演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衡量“最早中国”的不同标准,从而论述各种标准下的“最早中国”。

(三)政统模式,即通过将文献史料中的先商政权与特定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将“政统”授予这些考古学文化,进而将文献史料中最早拥有“政统”的政权(通常选用黄帝政权)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视作是“最早中国”。

(四)地域模式:划出特定地域来考察“最早中国”。

实际论证时,四种模式并非孤立,如身份观念模式与政统模式就常常联用,使文献史料以及能够体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出土文物具有一定的论证效力;在前三种论证模式中,地域模式也常常作为一种界定标准掺杂其中。使用文化要素模式时,同样可将政统沿革视为表明文化传承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需要辨清身份观念模式及地域模式之下的一些关键问题。

为了选取最为合理的论证模式,本文将从价值和技术两个层面对四种论证模式进行分析评价。“最早中国”问题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的核心之一。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创立伊始,便将重构上古史,“寻根问祖”、探索文明起源视作主要目的之一<sup>③</sup>。1985年夏鼐先生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后,又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推向高潮,并延续至今。这一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还原信史时代以前的历史真相,探清中华文明的源流,以完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并理解中华文明何以呈现为当今的形态<sup>[2]</sup>。近年来,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代表的反思民族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过往的民族主义叙事进行冲击,又使得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面临了新的挑战。

在上述四种回溯文明发展进程的载体中,文明所覆盖的地域具有较弱的稳定性,单凭地域来说明考古学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最难取信于人,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政统向来是证明政权合法地位的工具,政统的辨析也在中国

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然而其对于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消解<sup>[3]6-7</sup>。同一文明中的人群的共性,从根本上说,是具有相同的(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要素在内的)文化,而反思民族主义思潮所冲击的,也正是那些在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群之上所人为构建出的民族共同体。因此,选用文化要素作为回溯早期文明发展起源的载体,最为合理。文化上的身份认同观念历史较短,稳定性不高;且身份观念模式从技术层面看存在其他问题,后文将详述。下文便从论证技术的层面,来分析四种研究模式的优势与困境。

文化要素模式,指基于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出土材料的比较研究,考察文化要素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传承、发展、汇聚、扩散,再通过对于文化要素发展过程的回溯,来揭示各个考古学文化在文化要素上的继承关系,从而追溯到“最早中国”的论证模式。本文提出的“文化要素”,主要指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先民的制度文化及艺术,并辅以在不可证实不可证伪原则上进行讨论的思想观念。如许宏先生在论述二里头文化的历史地位时,便通过考察城市规划方式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室制度、墓葬制度,以及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等文化要素,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及殷墟之间的传承发展,联结了二里头文化与信史王朝,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二里头文化是为晚商和西周所承袭的早期中华文明中心文化<sup>[4]223-225.④</sup>。韩建业先生在论述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圈时,也通过对墓葬格局、随葬品等考古材料的分析,说明了中华文明文化要素在这一时期的逐步成形<sup>[5]</sup>。严志斌先生通过考察漆觚、玉柄型器、圆陶片、酒器组合在良渚至西周的演变过程,有力地说明了裸礼文化在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传承发展的情况<sup>[6]</sup>。如果此类证据充足有力,那么在论证相关考古学文化历史地位时,与文献史料相对应就不是那么急切。作为一种基于考古学材料、运用考古学方法(即许宏先生所说的“考古学本位”)的方式,通过文化要素模式得出的结论或许更具实证性。

身份观念模式在讨论“最早中国”时具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一模式下的论证,最早只

能回溯到何尊出土时的西周,即“宅兹中国”出现的时代。之前诸如“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的语汇,仅存在于后世文献史料的记载,反映的只能是文献成书时期的观念。其次,诸如成周“中国”说、“大邑商”“中商”“有夏之居”以及陶寺圭尺立表,学者们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有力的论证,解读出其中所具有的“地中之国”以及中心先进文明的含义。但如果将这些语汇或考古遗存作为直接依据,并将拥有这些观念的考古学文化视作早期的“中国”,其论据或许并不充分。从民族志可知,古代先民乃至现代土著都以自己的故土为宇宙中心,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比如澳洲土著对故土景观的每处山石、河流都充满了敬畏,将它们看作神话史诗的具体印迹,并代表他前世的光荣存在,俨然将本民族所处的位置想象成了世界的中心<sup>[7]</sup>;是故中华文明的先祖将自己视为“地中之国”,也是十分正常的。然而这些表示地域观念或是标榜自身文明程度的“中国”概念,都是观念史中的“中国”。今天学界讨论“最早中国”,所要探寻的实则是中华文明(同样被简称为“中国”)在起源阶段的关键节点,因而需要回溯当今“中华文明”种种文化要素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如果不将观念史上的某种“中国”概念与作为中华文明代称的“中国”加以区分,则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混乱,比如当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找出形似“中国”的符号,或者证明了有法老将埃及视作“地中之国”时,通过这样的逻辑就能将古埃及视作是“最早的中国”。

或许此前并未产生相应的理论自觉,但学术传统中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所载王朝对应的做法,其核心作用在于将数千年历史记载中所建构的先商王朝的政治正统,授予特定考古学文化,从而使之能够在政统意义上被视作是“中国”。比如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如果不将二里头遗址与夏都对应,就只能将二里头文化看作是最早的王朝国家,而不能将其称为“中国”,更谈不上“最早的中国”<sup>①</sup>。逻辑学上这一论断的逆否命题,就是只有将二里头遗址与夏都对应,(通过文献史料中夏王朝的政治正统)来说明二里头文化是(政统意义上的)“中国”。然而政统模式中的关键症结在于,这种模式要求必须能

够实证先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史料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以文化要素为追溯“最早中国”的主要载体,将政统继承降格为表明文化要素传承关系的一种方式,那么文献材料对于信史时代之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自然就下降了。

与上述三种模式稍有不同的是,很少有学者会将地域作为判定“最早中国”的直接依据。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中心文化引领着文明发展的进程,或具有主要的文化要素;如果存在,则这样的中心文化究竟存在于什么地域,是否仅存在于“中原”的范围之内。传统的文献史料清晰地呈现出了一条政统承袭的脉络,同时也有大量的考古学材料表明,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多个发展阶段中,中原考古学文化向四周强势扩张、辐射其文化影响力,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对外界的影响程度超出外界对它们的影响。然而古史辨派在20世纪20年代对文献上这种单一中心叙事的真实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在此之后,傅斯年先生、徐旭生先生相继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和“三集团说”等理论,将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与统一看作是两个或多个集团间相互碰撞的结果。至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模式与“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观;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展现了一幅相似的图景,这一点将在后文详加论述<sup>[8]1-2,6</sup>。基于上述理论依据,近几年中,李新伟先生对“中原中心”模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构<sup>[9]</sup>。总之,从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探寻文化来源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的角度出发,需要重新审视不同考古学文化在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 二、早期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确定以文化要素模式作为基本思路后,便可以对“最早中国”问题作出全面的考察。过去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应当确定“最早中国”的排他性标准,这一理念是否合适,或许应当进一步地考量。严文明先生曾指出,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过程,各个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共同体应都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之中<sup>[10]</sup>。

其所表达的理念,或许可以概括为“文明发展过程论”与“国家形成阶段论”。这种理念本来应当只是一种基本的认识,可当学界执着于找出一种单一的、排他的“最早中国”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之忽略了。总之,将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进行概括性地叙述,指出各个阶段意义上的“中国”的诞生,或许比单一地认定某种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要更加具有学术价值。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公开资料中,将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了各个阶段的断限与特点,为不同意义上“最早中国”的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张国硕先生与孙庆伟先生将界定多重意义上“最早中国”的理念率先投入于实践,将讨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两位先生的界定标准都取自于观念史,以张国硕先生的文章为例,首先梳理了观念史上“中国”词义由地域、国都、族群文明到国家的演变过程,加之当今考古学研究中“中国早期文化圈”的含义,从五个不同层面上分别界定出了“最早中国”<sup>[11]</sup>。然而探讨“最早中国”,或许并不是要从古人的标准之下找出答案,而是需要根据当今的学术取向,基于当今考古学界的理论概括,来揭示“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形态,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运用韩建业先生提出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以及王震中先生概括的“邦国—王国—帝国”这两种对经典理论的修正,可以对“最早中国”的发展过程做出一种合适的分段。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曾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框架,用以概括中华文明早期国家从诞生、成熟,到形成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发展过程<sup>[12]131-145</sup>。王震中先生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更为精准的概括,将其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的序列<sup>[13]</sup>。对于国家标准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上述的三阶段论或许可以视作是不同界定标准的一种调和,但它本身也向我们揭示,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即使从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找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独一无二的“最早中国”界定标准,也很难充分地证明这便是界定“最早中国”的最为合适的标准。而“邦国—王国—帝国”模式框架所揭示出的早

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多个断裂、或者说是质变之处,则提示我们可以从多种意义上来对“最早中国”进行界定。

“邦国—王国—帝国”的模式框架着眼于对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发展过程的概括,而在最早的文明国家诞生之前,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便已显现出雏形。既然将“最早中国”问题视作是对“中国”形成的各个阶段的讨论,那么讨论的范围也不应局限于国家的诞生,而应当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先生便提出了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史前文化格局,中原文化区为花朵的中心,在其周围其他文化区层层分布,这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sup>[10]</sup>;张光直先生也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指出自公元前4000年起,中国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开始具有了密切的联系,开始共享诸多考古学成分,且一定地域范围内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似性要胜过该范围外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圈。而且“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sup>[8]1-2</sup>。总之,此类理论的核心观念在于,在文明国家诞生之前,此后汇聚成中华文明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便已经开始了密切的交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相互作用的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在地理和文化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在这一文化圈内诞生了中华文明最早的国家。这一类理论在揭示“中国”的形成过程时,基本没有借助对政统传承以及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最早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这一共同体中开始起源的中华文明文化要素,可以视作是运用文化要素模式进行分析的一种典型实践。

### 三、不同意义上的“最早中国”

如今许多学者都指出,构成“最早中国”讨论的两翼,一翼是“中”,一翼是“国”,在“中”和“国”两个范畴上提出合理标准,再统合两种标准界定出一个“最早”,便可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最早中国”。依照这种思路,前文提出的文化要素模式即可视作是判断何为“中”的途

径,随后提出的国家发展阶段观念则是界定何为“国”的方法。早期中国文化圈并不具有“国”的含义,但它是“中国”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最早基础。“最早中国”问题固然要揭示“国”的形成,但处于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之下,揭示出文化意义上“中国”的发展过程,或许是应当放在首位的。综合上述论证,以下四种概念可以被视为最值得讨论的四种“最早中国”,即中华文明发展的最早基础、这一基础上最早诞生的文明国家、第一个强力对外辐射影响力并产生趋同性的王国,以及首先实现大一统的帝国。对四种意义上“最早中国”的界定,将构成“最早中国”讨论的基本范围,也将形成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基本叙述。这一讨论框架并非是封闭的,它着重于突出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节点,来描述“中国”起源与形成的过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明,距今约6000年前(或是更早的时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农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文化开始向文明社会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各地先民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包括对龙的信仰、对祖先的崇拜等)<sup>[14]</sup>。韩建业先生所提出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可以视作是对这一现象的最新理论总结: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时代,仰韶文化东庄一庙底沟类型向外强力扩张,使黄河上中游文化形成空前的趋同局势,且包括中原、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东北等诸多地区在内的中国大部分区域开始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这一超级文化共同体在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上,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sup>[5][15]</sup>。李新伟先生也指出,各考古学文化在随葬器物上较高的相似性,反映出各地区的社会上层之间在那一时期已经构建了交流网络,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尽管庙底沟文化究竟可否看作强势向外辐射的中心文化有待商榷,但至少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种文化交流圈的形成<sup>[16]</sup>。两位先生还归纳了在那一时期已经显现出雏形的中华文明文化要素,韩建

业先生提出的有以农为本、重视礼制、祖先崇拜等思想观念<sup>[5]</sup>,李新伟先生则从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角度进行了归纳<sup>[16]</sup>。“早期中国文化圈”为文化要素的发展奠定了地理与文化上的基础,堪称中华文明发展基础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这种意义上的“最早中国”并不指代某一特定的考古学文化,而是指各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基础。

探源工程同样指出,在距今5000年前,以良渚文化为代表,部分区域的社会建立了国家,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多个文明国家并立,中华文明进入了“古国时代”。在各个早期文明国家中,良渚文化最早进入文明社会阶段,且文明程度最高。不同规格间差异巨大的墓葬等级、象征神权的神人兽面纹以及明显居于核心地位的良渚遗址,说明良渚文化已产生明显的社会分化。良渚遗址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制作大量珍贵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专业工人数量也很庞大。可见良渚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 and 动员能力,非国家无以为之<sup>[17][18]</sup>。良渚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内第一个进入文明社会的考古学文化,尽管良渚文化地处中原之外,但基于文化要素模式的基本思路,通过玉器形制、裸礼文化等文化要素在二里头与商周文化传承发展的事实<sup>[6][18]</sup>,便能表明它至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但如果需要明确良渚文化具体的历史地位,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来对几个关键问题做出解答:良渚文化作为一个能够控制一定地域的早期国家,究竟应该被认定为“邦国—王国—帝国”发展序列中的邦国还是王国?对于其后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能否被认作是中华文明各文化要素的一个重要源头,亦或许只是产生了较小影响的支流?这需要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更多文物的出土及解读。

在距今约3800年的时限上,探源工程的报告中又作出了重要划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在继续持久地接受周围先进文化因素的同时,自身一些特征性较强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对外辐射,而且辐射的范围很广,为先前所未见。二里头文化即是其中的代表。二里头都城整体平整

有序的规划,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专门祭祀区域和祭祀遗存体现的祭祀制度,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承上启下的玉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特殊“重器”所显示的器用制度,显示出二里头文化具有“断裂性”发展特点的较高文明水平。也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空前的对外辐射力以及对其后二里岗文化、晚商王朝在文化层面上的重要影响<sup>[1][4]</sup>。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当为“王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然而二里头文化也面临着与良渚文化相似的两个问题:首先,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等,都已经具有对外扩张性,能控制一定的区域,而其后的商周王朝,控制的区域又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愈发增大,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体现二里头文化作为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特殊地位?其次,若不借助文献中夏商王朝之间的政统传承关系,如何证明二里头文化是一个由二里岗文化及晚商王朝所主要继承的、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中心文明?在这两个问题上,以许宏先生为首的考古团队已经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包括证明二里头文化与此前考古学文化在发展进程中的“断裂式”进步,以及和二里岗期、殷墟期商王朝在城市规划、墓葬制度和器用制度上的高度相似性,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与界定良渚文化历史地位时的状况相同,二里头文化作为文明发展进程中第一个“王国”的地位基本取得共识,只是仍需要更充分的考古证据来对其历史地位进行细化的、完善的界定。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朝首次建立大一统集权统治,当属帝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自此,中华文明结束了考古学界所讨论的早期发展阶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 余 论

综上所述,在“最早中国”不同界定标准之下,还存在着论证模式的分野。四种论证模式中,当属“文化要素模式”最具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文明起源过程论”与“国家发展阶段论”的基本理念,由“早期中国文化圈”“古

国”“王国”“帝国”四种考古学概念出发,提出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圈是文明发展基础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良渚文化是早期文明国家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二里头文化是广域王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而秦王朝则是帝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其中良渚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地位尚存一定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但根据现有的材料,将它们定性为各自意义上的“最早中国”,应当是合理的。

本文所支持的“文化要素模式”,虽然相较于其他三种论证模式更具合理性,但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也都有尚待完善之处。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文化要素模式需要对时时刻刻不断融入中华文明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也具有包容性,完善对于文明起源的定义,否则便可能因为文明源头过于庞杂而陷入哲学上的“起源不可知论”。进一步而言,面临现代化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文化样貌以及相应的身份认同挑战,对于“文化要素”概念的定义也需要进行细化或修正;甚至说问题背后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等概念,虽然如今国内学界在大体上能够达成一致认识,但其背后仍然潜藏着学理上乃至政治上的争议。若想在最大程度上达成“最早中国”问题的定论,这些概念问题上的争议或许将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与此同时,考古材料与文化要素(尤其是思想观念)相对应的方法论也需要得到理论层面的发展。而在学术实践上,更丰富的考古材料、更精妙的论证方式不但能更加充分地说明各考古学文化间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关系,还能为理论层面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推动新方法、新理论的诞生。任何理论都不会是毫无缺陷的,对于一种尚待发展的理论而言尤其是如此。尽管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在讨论“最早中国”问题、追溯中华文明起源时,文化要素模式将会是最接近实现讨论目标的一种论证模式。

### 注释

①孙庆伟:《“最早的中国”新解》,《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张国硕:《也谈“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韩建业:《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

成》,《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②陈淳:《科学地探索夏朝与“最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0日。李新伟:《从广义视角审视“最初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1日。③许宏:《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读书》,2016年第4期。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年第3期。李伯谦:《中国考古学的历程·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页。④赵海涛、许宏:《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的历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5页。

#### 参考文献

- [1] 赵海涛,许宏.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的历史位置[J].南方文物,2019(2):57-67.
- [2] 许宏.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J].读书,2016(4):3-11.
-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4] 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5] 韩建业.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J].中原文物,2019(5):60-65.
- [6] 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型器[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1):6-22.
- [7] 陈淳.科学地探寻夏朝与“最早中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6-10(07).
- [8]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55年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9] 李新伟.“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J].南方文物,2020(1):1-8.
- [10] 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文物,1999(10):27-37.
- [11] 张国硕.也谈“最早的中国”[J].中原文物,2019(5):51-59.
- [1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13] 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8-32.
- [14] 王巍.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9-28(15).
- [15]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J].考古,2012(3):59-69,109.
- [16] 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J].考古,2016(3):86-92.
- [17] 韩建业.良渚:具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8-05(05).
- [18]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J].中国文化遗产,2017(3):4-21.

## Demonstrating Patterns, Developing Periods and “the Earliest China” in Various Meanings

Bao Yifan

**Abstract:** In today's discussions on “the Earliest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four different demonstrating patterns——“the Pattern of Cultural Element”, “the Pattern of Identity”, “the Pattern of Political Orthodoxy” and “the Pattern of Region”——actually leads to different opinions, which hasn't been clearly known by the scholars. Of the four different demonstrating patterns,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Element” is the most reasonable one, whether on value or on technical feasibility. As the origin of the civiliz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untries are progressively courses, comparing to pointing out an exclusive answer,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point out “the Earliest China” in various meanings. Basing on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Element” and the ideal of developing periods, as well as using the four archaeological concepts——“Earliest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 “Nation”, “Kingdom” and “Empire”, the following opinions are figured out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Earliest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 in the Miaodigou Era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Earliest China” in the meaning of developing foundation. Secondly, the Liangzhu culture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Earliest China” in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civilized nation. Thirdly, the Erlitou culture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Earliest China” in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wide-area kingdom. Finally, the Qin empire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Earliest China” in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unified empire.

**Key words:** “the Earliest China”;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Element”; “the Earliest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 the Liangzhu culture; the Erlitou culture

[责任编辑/原 孟]